

# 翻译与政治之间:

## 五、六十年代中国译介尼采的语境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崔峰

---

传统的翻译研究将原著视作判定翻译的权威。技巧的提高、理论的分析、译本的比较与评判，以及由此直接引出的对一个所谓“好”、“坏”翻译家，或“好”、“坏”译作的决断等，都是将译文视为原文的附属品，译文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原著中心论”（original-text oriented）的论述模式本质上说只能算一种翻译实践或技巧层面的“翻译批评”，而非学术性的“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种严肃的学术科目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在西方出现。以译文为中心（target-text oriented）的研究模式将译作从原著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传统翻译批评中对原著过于依赖的局面得到突破。译作成为翻译研究中可被视作独立研究对象的“生命体”。

作为这类研究观念的深入与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被提出来之后，<sup>1</sup> 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让我们看到“翻译并不是一项‘单纯’（innocent）的工作，而是跟很多人的政治意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sup>2</sup>

---

<sup>1</sup> 苏珊·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在 1990 年编辑出版的《翻译，历史和文化》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èv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1990) 里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

<sup>2</sup>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页 33—34。

因而，在这样的研究理念下，本论题所针对的“中国译介尼采的语境”不会从传统的翻译实践或技巧层面，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作品中译本与其德文原本或转译过程中译者所依托的英译本进行文本间的比较，来品评中译本的所谓“忠实”、“对等”与否。本文将把楚图南（1899-1994）及其1950年代《查拉斯图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的译本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关注翻译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学、文化目的，以及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外国作家；将翻译文学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中进行考察，阐释文学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形态，为达到某种文化目的而做的翻译上的处理及其文化效果等。

## 二

1949年7月，高寒（即楚图南）所译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初版问世，1952年1月第2版问世。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楚图南的这个译本是“十七年”间中国大陆译入语语境中对尼采译介的唯一作品。

那么，为什么在1952年的历史语境之下，尼采的作品得以在中国大陆译入语语境中出版？而之后的“十七年”间，在译出语语境的主流文学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尼采及其作品，为什么又长期“缺席”了呢？

对这些问题的考察首先要从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新政权后，对翻译工作的组织化、计划化，对翻译家的规训，以及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文学作品成为“国家话语”建构的一部分等现象谈起。

1949年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在周恩来（1898—1976）的提议下成立了全国性的文艺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有学者就称它的突出意义在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绘制了一个对日后文学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体制”<sup>1</sup>。

---

<sup>1</sup>斯炎伟：〈在焦灼与兴奋中趋于大同：“十七年”作家体制心理的生成〉，吴秀明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页220。

在大会将毛泽东（1893-197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方针及“工农兵”文学成功确定为中国文艺界未来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后，如何确保该原则的顺利实施，便是共产党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方案了。而动用国家机器，以具体组织机构的形式，达到对艺术家的统一规训、对文艺政策的统一调控和实施，无疑可以将共产党的文艺原则从“纸上谈兵”转化到具体落实。会议的最后一天，“文联”宣告成立。随即，“文联”旗下的各种协会陆续成立。最早的就有在7月24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不久，“文联”属下的各种相关文艺团体与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相继成立。“文联”、“文协”等机构成立之后，各地文艺工作者纷纷加入相应的文艺协会与组织，开始接受“党的领导”，并进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实践，这里面就包括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

1954年，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成为建国初期翻译活动走向组织化、计划化的标志。此次会议的重点之一即是解决“如何把全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更加团结地组织起来，更加有计划地来进行翻译工作”这一问题。<sup>1</sup>为此，茅盾（1896-1981）在其纲领性报告〈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中指出：要“有方法、有步骤的”<sup>2</sup>改变过去翻译工作中“无组织无计划状态”<sup>3</sup>。

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制定统一的翻译计划<sup>4</sup>；通过国家及公私合营的文学出版社和《译文》杂志“有步骤地组织翻译、校订和编审出版的工作”<sup>5</sup>；将作为个体的翻译工作者融入到统一的计划中<sup>6</sup>。这些措施将“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总署领导下，由作家协会、有关的文学研究机关、文学出版机关、刊物编辑部和全体文学翻译工作者共同来执行”<sup>7</sup>。

这样，通过翻译活动的组织化与计划化，翻译文学成为“国家话语”建构的一部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文学翻译择取的首要标准，而外来文学

---

<sup>1</sup>孟昭毅、李载道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88。

<sup>2</sup>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见《译文》，1954年10月号，页8。

<sup>3</sup>同上，页5。

<sup>4</sup>同上，页8。

<sup>5</sup>同上。

<sup>6</sup>同上，页10。

<sup>7</sup>同上。

进入当时中国的译入语语境则必然要符合这样的“规范”（Norm）。翻译活动的组织化与计划化使“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得以加强，从而使具有“多元化”意识形态及诗学的外国文学作品因受制于这种“规范”，而被排除在当时文学翻译的择取对象之外。<sup>8</sup>

### 三

由此，我们可以关注到，1952年之后，尼采译介在中国大陆译入语语境中的“缺席”就有其必然性了。

我们首先从“诗学”层面来观察。“十七年”间，尤其是1950年代，在苏联文学视域的影响下，中国大陆译入语翻译界认同、择取外国文学已然变成了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其中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接受了苏联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诗学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坛“集体缺席”的状况与苏联文艺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态度息息相关。当日丹诺夫（Andrei Aleksandrovich Zhdanov, 1896-1948）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全世界各民族和各国文学中间最年轻……最有理想、最先进和最革命”<sup>1</sup>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方法之时，也同时将资本主义文学推向了以“堕落”、“衰颓与腐朽”为特征，且充满“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的境地。<sup>2</sup>这也就使得“没有塑造令读者喜闻乐见的英雄人物或伟大形象……从那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市井小人身上去寻找创作素材”<sup>3</sup>的现代主义文学必然成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动”。因此，当时中国文坛在论及现代主义文学的文章中，现代主义文学都被冠以“颓废主义”、“反动文学”的称号，视为政治意

---

<sup>8</sup> 有关1950年代初翻译活动的组织化和计划化，可参见崔峰〈论建国初期翻译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以“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为中心〉，见宋炳辉等编《润物有声——谢天振七十寿诞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页3-15。

<sup>1</sup> 日丹诺夫著、戈宝权译〈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22-23。

<sup>2</sup> 同上，页23，24。有关日丹诺夫主义与1950年代中国文坛的关系，可参见崔峰〈“日丹诺夫主义”与195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文坛——以《译文》为例（1953年7月号-1956年3月号）〉，见王宏志编《翻译史研究（201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50-290。

<sup>3</sup> 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页41。

识形态的颠覆者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异端”。<sup>1</sup>这种诗学观念上的倾向也就使得当时中国翻译界对于欧美文艺作品的择取主要是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反帝反封建，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残酷的进步意义”<sup>2</sup>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诗学”观念上的倾向使得诸多无助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及从美学层面能够丰富译入语文学话语的外国文艺作品被抛弃在文学翻译的视野之外。

显然，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尼采哲学思想<sup>3</sup>首先就被纳入到了“反动”的“诗学”范畴。但是，需要思考的是，“诗学”因素是否是尼采译介“缺席”的根本原因？

我们先以与尼采哲学思想颇有渊源的存在主义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坛的译介情况为例进行考察。在“十七年”间，中国大陆有一份唯一公开发行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期刊——《译文》（1959年1月更名为《世界文学》），它是当时中国国民了解、认识外国文学作品、文艺动态的最主要的渠道之一，是一份国家级、“体制”内的重要期刊。这份期刊对当时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进行了一次“戏剧性”的译介历程。

1951年7月，萨特还被排除在“战斗的法国进步文学家”之外，被视作“反动的”“唯生存主义”倡导者。<sup>4</sup>其原因是因为萨特曾发表过“（共产党人的道德）已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一种小资产者的道德”<sup>5</sup>等方面的言论。<sup>6</sup>但很快，中国文坛对萨特态度发生了鲜明变化<sup>7</sup>；根本原因就在于，从1951年底

---

<sup>1</sup> 查明建《意识形态、诗学与文学翻译选择规范——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香港岭南大学博士论文，2003，页74。

<sup>2</sup> 查明建《文化操控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见《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页88。

<sup>3</sup> 关于尼采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已经有诸多论文论著面世。如 Keith M. May, *Nietzsche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emes in Yeats, Rilke, Mann and Lawrence* (Texas: St. Martin's Press, 1988)。Herbert W. Reichert, *Friedrich Nietzsche's impact on modern German literature: five essays* (Raleig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sup>4</sup> 许钧、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页89。

<sup>5</sup> 萨特著、潘培庆译《词语》（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254。

<sup>6</sup> 同时，1948年上演的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也在客观上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损害”。同注17，页89。

<sup>7</sup> 1954年5月萨特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访问了苏联；甚至到了1955年9月，他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又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其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规格接待。

开始，萨特参加了一系列支持法共的活动<sup>1</sup>，而成为了共产党的“同路人”。

《译文》甚至撰文赞扬萨特从过去“唯心的、消极的存在主义”提倡者于“近年来开始转变，不断进步”<sup>2</sup>。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一直从事“存在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作家，其在文学、学术领域的“落后”已然变得微不足道；他的政治立场转变方成为译入语语境对其做出肯定与积极评价的实质因素。萨特亲共的政治身份加上其巨大的国际声望使他在社会主义国家获得广泛欢迎。在 1950 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文坛，面对政治与文学的相互纠结，对《译文》而言两权相较取其重，一个外国作家的政治身份要远比其文学成就、文学经历重要得多。即便如萨特在其文学生涯中曾是“反动”的现代派作家，但只要其转变到“正确”的政治立场上，过去的“反动”经历都可以继往不咎。当然，可以想见的是，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该阶段《译文》中集体“缺席”、甚至对作家的现代主义创作背景都要在作家介绍中三缄其口或加以批判的情况下，作为戏剧家萨特最重要的代表作《苍蝇》（1943）——一部为了唤起法国人“自由意识”的存在主义作品根本不可能获得在《译文》上刊载的可能。在“冷战”时期，中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译入语环境中，《译文》于 1955 年 11 月号上刊载的萨特的一部独幕剧《丽瑟》被视作了“无情揭露黑人在所谓‘民主自由’的美国所遭遇到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以及美国反动阶级的专横残暴和卑鄙无耻”<sup>3</sup>的典范之作。

而就在萨特表现出亲共立场之后，同为法国存在主义大师的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即表示不满，并与萨特渐行渐远，甚至二人在政治观点上展开笔战，由昔日好友成为生死对头。我们可以注意到，对《译文》而言，当一个作家的政治立场重于其文学名望时，萨特的部分文学作品、文学和政治活

---

<sup>1</sup>如反对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应法共知识分子要求参与营救反战救士兵马丁。1952 年 5 月，法共领导人在美国被捕，原本就痛斥美国侵朝的萨特迅速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支持法共，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1955 年 6 月，萨特的戏剧《涅克拉索夫》上演，表现出亲共的倾向，萨特说，“我想在我的新作品中揭露反共宣传的手段……以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作出我作为作家的一份贡献”（同注 27，页 274）。

<sup>2</sup>罗大冈〈萨特的新著：“尼克拉索夫”〉，见《译文》，1955 年 8 月号，页 244。

<sup>3</sup>“世界文艺动态”，见《译文》，1955 年 11 月号，页 257。

动在整个 1950 年代都得到了译介的可能，但加缪的作品不仅在《译文》上处于全面“缺席”的状态，更因为其政治立场的“不正确”而受到批判。<sup>1</sup>

不过到了 1960 年代，当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系统阐述其存在主义观点，并在分析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时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完全歪曲了、变质了”<sup>2</sup>的时候，萨特与共产党“同路人”的关系也就此结束——这一政治身份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其文学、学术领域的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译入语语境中，被再次贴上了“反动”标签而加以批判<sup>3</sup>。

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虽然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诸多流派与尼采哲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诗学”显然并非译出语中作家的文学名望（literary fame）在译入语语境中被如何建构的决定因素。而作家的政治身份、政治立场远比“诗学”因素更为关键。但是尼采不同于萨特之处就在于，其政治立场并非“己出”，而是由于他的哲学思想在政治话语关照下的特定年代被挪用、被阐释，其身份才被贴上了与政治相关的标签，并最终导致了译入语语境对尼采译介的“缺席”。

#### 四

那么，尼采哲学及其译介与政治的纠结呈现出了哪些特征？首先我们需要关注尼采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二战”时期的德国畅销一时，为士兵们行军囊中的必读物。于是英美的学者遂指责尼采为纳粹野蛮主义的发布人。<sup>4</sup> 不管尼采是否应该背负“纳粹的先驱”这样的“罪名”<sup>5</sup>，但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尼采成为德国、意大利反动政治家顶礼膜拜的对象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他们法西斯种族主义独裁专政的理论里，处处

---

<sup>1</sup>1958 年 12 月，《译文》刊载苏联《文学报》社论《国际反动派的挑衅》，指责加缪“向苏联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进行攻击”。〈国际反动派的挑衅〉，见《译文》，1958 年 12 月号，页 165。

<sup>2</sup>徐崇温等《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 61。

<sup>3</sup>程宜思〈存在主义文学印象〉，见《光明日报》（中国），1962 年 6 月 29 日，版 3。

<sup>4</sup>德国学者纽曼就曾言：“五十个华格纳会比一个尼采把国家带到更恶劣的灾难中吗？”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页 82。陈鼓应在文中指出，尼采被诬枉为纳粹的先驱而使其背负罪恶之名，是一种重大误解，实在应归咎于他的妹妹。楚图南也指出“把他当作法西斯的先驱者，也似值得斟酌”。尼采著、楚图南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页 3。

<sup>5</sup>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页 82。

可以看到“幕后晃动着的尼采的幽灵”。例如墨索里尼在一封通信中说：“在你给我的信上，你说我的演说及笔调有着尼采的口味，你说我研究过尼采，的确如此。十五年前，……我偶然得到他的著作。那是我从头至尾读破了的的东西，我从那里受到很大的感染，他的著作医治了我的社会主义。”又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强者处于统治地位，而且为了不致牺牲自己的力量，不能和弱者调和，……要是这种法则不能支配着，人类就不可能有向最高生命发展的一切运动。”<sup>1</sup>

故而，在苏联 1950 年代出版的大词典里，尼采的词条是这么解释的：“极端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剥削和侵略行为的公开辩护者，法西斯‘思想家’先驱。”<sup>2</sup>“尼采的哲学……恰好符合法西斯分子的思想体系。过去，尼采的哲学曾被希特勒分子广泛地利用过，今天，它又被帝国主义的新法西斯的思想家利用着。”<sup>3</sup>

以此，我们来反观译入语语境。从 1941 年毛泽东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反法西斯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 1949 年之后执政时期重要的宣传口号。1950 年代的中国翻译界译介反法西斯主义的外国文学作家、作品是译介工作的重心之一，这些译作显然对于刚刚从反法西斯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走出来的“新中国”而言，更能让人体会到革命胜利、社会和平的来之不易。

而在当时《译文》（《世界文学》）就经常性地以反法西斯为主题，对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译介，充分反映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法西斯主义的排斥。而当尼采被贴上了“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家，法西斯理论的直接创造者”的标签后，长期以苏联文学视域为参照的中国翻译界——特别是“一切向苏联学习”的 1950 年代——对尼采译介的“缺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同时，当 1949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一以贯之地实施“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以“解放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主题为建政后

---

<sup>1</sup>谢伟民《尼采、法西斯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见《读书》，1986 年第 10 期，页 108。

<sup>2</sup>罗森塔尔、尤金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简明哲学辞典》（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页 91。

<sup>3</sup>同上，页 91—92。

的文学“正统”，达到巩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因而，曾经受尼采影响，而在文学主张上又是非“正统”的文艺流派在“十七年”间的大陆受到批判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比如，在 1940 年代国统区出现的“战国策派”，以及由其中林同济、陈铨、雷宗海等人兴起的一阵“尼采热”，在 1940 年代就遭到“解放区”文艺界及“进步人士”的批判<sup>1</sup>，建国之后长期被视作“鼓吹反法西斯主义反动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极力为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内蒋介石集团维护反动统治寻找理论依据”。<sup>2</sup>又如，196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联斯·费·奥杜也夫著、允南翻译的《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一书，原著在苏联由苏共中央附属高级党校和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前言”部分直接将“二战”后尼采哲学著作在资本主义国家书报市场上的“泛滥”视作“过去一直被德帝国主义思想家用以论证侵略政策的尼采学说今天已经死灰复燃”，并认为“这种使尼采复辟的措施无疑是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治集团所奉行的公开支持军国主义、复活法西斯主义的方针密切联系着的”<sup>3</sup>。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反法西斯主义”本来并没有牵涉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语境中，从历史渊源上讲，中苏等国与英美等国在“二战”期间均为“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但是在 1950 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法西斯主义的对立，被中国翻译界纳入到了反欧美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1953 年 8 月号的《译文》刊载了保加利亚诗人瓦普查罗夫的四首反法西斯诗作。编者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保加利亚是长期受德国法西斯侵占的国家，而最终使保加利亚获得解放的国家即为社会主义苏联。故而不就难理解，编者在该期后记中，对其诗作的解读侧重于诗学层面的社会主

---

<sup>1</sup>在当时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文化杂志》、《野草》、《群众》上相继发表的文章包括李心清《“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实质》、《“战国”派对战争的看法帮助了谁》、欧阳凡海的《什么是“战国”派的》、洪钟《“战国”派文艺的改装》、曹和仁《权力意志的流毒》等。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 640。

<sup>2</sup>许全兴、陈战难、宋一秀《中国现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页 482、483。

<sup>3</sup>斯·费·奥杜也夫著、允南译《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页 1。

义写作手法，并以此上升到“对工人阶级的热爱和对人民敌人的憎恨”<sup>1</sup>这一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体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层面上。

1956年5月，《译文》刊载了民主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在第四届德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伟大的变化和我们的文学》，其中便提到：

我们周围的世界究竟是一付什么面貌呢？——我们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解放出来已经十年了。人们刚刚在废墟中动手建设，刚刚开始铲除法西斯主义的时候，西方国家就一再向他们灌输不能铲除法西斯主义的理论。<sup>2</sup>

言外之意即是，当下的西方国家纵容法西斯主义的存在，而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执行者，从而为其赞扬社会主义“伟大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样，《译文》在刊载澳洲小说家阿尔德里奇怪《在意大利》时解读道：“所谓‘盟国’的英美政府……玩弄卑鄙的手段，延不开辟第二战场”，并进而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完全消除”<sup>3</sup>，以此点明反法西斯主义还需要依靠社会主义国家——这方是中国文坛译介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根本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一书对尼采加以批判的实质目的并非出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实则以尼采及尼采哲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联为切入点，行批判资本主义之实。这也无怪乎此书在结束语中几乎通篇以尼采哲学视作“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辩护者”加以批判，并认为此现象“企图引诱劳动群众离开科学的社会主义”<sup>4</sup>。对尼采及尼采哲学的分析与批判已经完全脱离了诗学层面，甚至也被剥离出了与法西斯的关系，而被纳入到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话语层面——这无疑更契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通过对原作的“该写”（rewriting）<sup>5</sup>，翻译文学参与到了新的国家话语

---

<sup>1</sup> “后记”，见《译文》，1953年8月号，页220。

<sup>2</sup> 安娜·西格斯〈伟大的变化和我们的文学〉，见《译文》，1956年5月号，页158。

<sup>3</sup> “后记”，见《译文》，1953年8月号，页221。

<sup>4</sup> 斯·费·奥杜也夫著、允南译《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页256。

<sup>5</sup> 西奥·赫曼斯指出，所有的翻译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对原文某种程度上的操控（Theo Hermans（1985）.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in Theo Hermans（ed.）, *The Manipulation*

的建构中。相较于单纯地“反法西斯主义”这一命题，新生的政权通过文学（包括翻译文学）为政治服务，以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建构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并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并在当时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局势下，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是当务之急。

故而，像尼采这样与法西斯主义有千丝万缕之联系的作家，不仅不可能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语境下得到全面、充分译介的可能，也直接或间接地被纳入到了巩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资本主义——这一在当时更为迫切的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中。

## 五

接下来我们再观察译者楚图南的情况。正如前文所述，当时中国官方对作家（包括翻译家）的组织化管理主要是通过“文协”（1953年更名为“作协”）展开。虽然，中国“作协”的章程中标明它是“中国作家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sup>1</sup>，但从其创办的过程、方针、目的，及官方背景，我们已可以明显体会到这一团体所带有的鲜明的政治色彩。“作协”在对作家（翻译家）的创作活动、艺术交流、正当权益起到协调保障作用的同时，更注重它对作家（翻译家）文学活动进行政治性的领导和控制、提出应循的思想艺术路线，以保证文学规范的实施。

而在1949年7月，中共革命胜利前夕的“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楚图南参加了“南方代表第一团”，<sup>2</sup>并于1952年加入“文协”。

---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p. 11.)。勒菲弗尔又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rewriting)，改写即操控(manipulation)(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1992).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in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vii.)文化操控是文学翻译中的普遍现象，但操控的具体方式各有不同。《译文》的编者、译者在作品择译的过程中，首先将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的作品首先被排斥在翻译选择范围之外，对比较符合翻译选择规范的作品，则再通过“译后记”、“编后记”、“后记”、评论等“改写”和“操纵”方式，使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切合“译语文学当下流行的风格和主题”(Theo Hermans (1985),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p.11.)。

<sup>1</sup>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23。

<sup>2</sup>〈大会代表名单〉,见丁景唐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1976·史料·索引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页721。

由此足见，1949年之后的楚图南已经成为“体制”内的一名作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规训。这就意味着，对一名翻译家而言，对外国作家、作品的择译再也不可能“私人的事情”，其翻译的文学作品必须被纳入集体话语的表述范围。

故而在1952年之后的“十七年”间，从1930年代就开始翻译尼采作品的楚图南，一直要到1987年，才重新出版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以楚图南的话说，即是：

我们能在开放、改革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重新介绍、评介尼采的作品和思想，以活跃我们的学术空气，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扩展我们的学习视野，是不无裨益的。<sup>1</sup>

从中可见，译者楚图南其实清楚地看到，只有在“新时期”的译入语语境下，“一元化”的国家话语体系被打破，多元思潮出现或涌入，译者的主体性可以充分发挥，并凭借自己的“喜好”参与到翻译活动中时，对尼采的译介才可能重新出现在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1950年代楚图南放弃了对尼采的译介，而转向继续译介希腊神话传说——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其译著《希腊神话和传说》。究其原因就是翻译古典文学及古希腊文学作品，在当时的译入语语境下是稳妥、安全、政治正确的翻译活动。一方面，时任文化部部长、《译文》主编的茅盾，作为当时中共文艺政治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译文·发刊词》中即点明：

今天我们不但迫切地需要加强学习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也需要多方面的“借鉴”，以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因而也就需要熟悉外国的古典文学和今天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及殖民地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sup>2</sup>

---

<sup>1</sup>尼采著、楚图南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页3。

<sup>2</sup>茅盾〈发刊词〉，见《译文》，1953年7月号，页2。

并多次在《译文》“稿约”中欢迎“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的译稿”<sup>1</sup>、开辟“世界文学遗产”专栏，从而为当时对外国古典文学的译介营造了政治“正确”的译入语语境。另一方面，翻译欧洲古典文学，包括古希腊文学，也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翻译行为。<sup>2</sup>

综上所述，在“主流意识形态”操纵一切的时代文化语境下，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导致翻译系统的“赞助人”（patronage）实际上就是国家和领导者，而包括文艺观念在内其它操纵因素则受到压抑，作为翻译文学直接创造者的“翻译者”则必须在限定的范围内择取翻译对象。

## 六

最后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 1952 年 1 月，楚图南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译本可以出现在中国大陆？这就与当时出版这一译本的机构上海文通书局的性质有关。

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时就设立了“翻译局”。1951 年 11 月，翻译局召集全国各编译机构、各主要出版社的代表和各方面的翻译家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翻译局局长沈志远（1902-1965）在大会报告突出强调了要首先要通过加强对翻译出版业的管理来实现翻译工作的组织化、计划化：

各公营或公私合营出版社，须依各自专业方向及自身力量，分工合作，共同参加全国翻译计划的执行，并将各该出版社的翻译计划及执行情况，定期呈报主管机关。这也是实现计划化所要求的制度。<sup>3</sup>

---

<sup>1</sup> “稿约”，见《译文》，1956 年 9 月号，版权页。“稿约”，见《译文》，1957 年 1 月号，版权页。

<sup>2</sup> 当时由胡乔木提议、毛泽东批准周作人继续从事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龚育之〈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见《读书文摘》，2010 年第 6 期，页 54—55。

<sup>3</sup> 沈志远〈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见《翻译通报》，1951 年第 3 卷第 5 期，页 15。

事实上，早在 1950 年《翻译通报》创刊时，沈志远就对 1949 年前“无组织、政府的”翻译市场提出了批评，并指出新中国将“不能再容许其继续存在了”<sup>1</sup>。同样，茅盾在 1954 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观点与沈志远几近一致的观点。<sup>2</sup>

正如笔者曾言：

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最终的成果是要通过出版机构的运作来完成和体现。然后再通过市场流通，呈现给读者，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可以说，从译品的择取，到读者的反应，出版是其间最核心的一环。规定了出版机构的经营模式，实质上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规范”，首先来决定某部作品能否成为潜在的出版对象；再由出版机构决定由谁来翻译；译稿出来之后，再先通过内部审查的形式，决定是否要对译作的内容进行“修正”，以达到某些“规范”的要求；最后，再通过考察它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意义和后果，决定是否将它推向市场，介绍给读者。<sup>3</sup>

以此角度审视沈志远和茅盾就出版与翻译工作组织化的关系所提的相关论断，就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而言，实是情理之中。

一旦翻译出版的市场化被取消之后，通过迎合读者阅读兴趣来追求翻译出版的利润化将不再可能。读者的“利益”已被沈志远、茅盾等人的代言所取代：即读者应从译文中获取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思想。当翻译出版走向“国有化”之后，翻译就再也不可能成为“私人的事情”了。趋附于“读者”背后的意识形态，成为翻译出版的当务之急。

这样，从 1950 至 1954 年间，国家出版总署通过对公私出版社实行改组，建立了统一的发行渠道。翻译文学的出版不可避免地在出版机构的整顿大潮中受到影响。<sup>4</sup>如前文提及的《译文》就归直接隶属于新闻出版总署的人民文学

---

<sup>1</sup> 沈志远〈发刊词〉，见《翻译通报》，1950年第1卷第1期，页2。

<sup>2</sup> 同上，页6。

<sup>3</sup> 崔峰〈论建国初期翻译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以“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为中心〉，页9。

<sup>4</sup> 相关论述及资料梳理可参见崔峰〈论建国初期翻译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以“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为中心〉，页10-11。

出版社出版，从译文择取、编校安排等方面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进行统筹安排。<sup>2</sup>

而文通书局早在 1949 年 7 月即出版过楚图南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译本。作为民国七大书局之一文通书局在 1908-1952 年间均为民营出版机构。<sup>3</sup>在 1949 年之后，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尚未完整的过渡期，以及共产党对翻译活动计划化、组织化的摸索期，文通书局得以仍然能够配合译者的个人喜好而进行翻译出版。一旦在公私合营完成之后，共产党对翻译活动计划化、组织化正式行成，文通书局也就走入了历史。而那些进入“体制”内的翻译家的译作也必须由国家控制的出版机构出版，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下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楚图南在“十七年”间翻译出版的《希腊神话和传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也就不足为怪。而相比之下，如查良铮（1918-1977）一方面由于“历史反革命”的政治身份，一方面由于其所译之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以致与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相悖，任何一家国有出版社都不可能出版其译作。<sup>4</sup>

可以说，在“十七年”间，译入语语境中翻译文学系统内的译者、出版社、赞助人，以及系统外的作家、作品无时无刻不受到政治语境的影响和操控。综观整个 20 世纪，中国大陆对尼采作品的译介历程，无疑在“十七年”间出现了断层。直至 1980 年代，中国大陆打开“国门”，重新“拥抱”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潮时，尼采作品才重新在中国大陆获得了译介的可能。当然，这种可能产生的原因，依旧与彼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翻译与政治的纠结又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

---

<sup>2</sup> 有关1950年代初政治文化语境下《译文》的创刊过程可参见崔峰《建国初政治文化语境下的《译文》创刊》，见《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1期，页34-47。

<sup>3</sup> 卢川《文通书局小述》，见《深圳商报》（中国），2012年7月19日，C06版。

<sup>4</sup> 查明建《意识形态、诗学与文学翻译选择规范——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香港：岭南大学博士论文，2003，页64。